
也谈汪精卫为何从重庆出走

——与叶岗同志商榷

王士花

看到叶岗同志所写《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》^①一文题目时,我很欣喜,一下子产生了一读为快的愿望,因为我一直对汪伪问题很感兴趣。但细读全文,不觉怅然。我不仅没从文中找到新的资料,相反,却发现作者所论,有与历史资料不符的地方,作者分析汪精卫出走的原因:第一是“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”;第二是“出于其妥协求存的幻想”。我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,现根据历史资料谈一下自己的看法,与叶岗同志商榷。

一

首先,汪出走的第一个原因,究竟是“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”,还是他的民族投降主义?

1938年12月底,汪在逃出重庆后,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《艳电》及《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》,响应《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》,对于严重分割中国行政主权及领土完整的“近卫三原则”表示赞同,并劝国民政府“以此为根据,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,以期恢复和平”。他认为:“今日方既有此觉悟,我方自应答以声明,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,而努力折冲,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,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,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。”^②

1939年3月27日,汪精卫又在《举一个例》文中宣称,“主和”是其“对于国事的主张”,“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,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

① 载《抗日战争研究》,1994年第3期。

② 黄美真、张云编: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,第371—374页。

道”，直言他之所以离开重庆，就是对日议“和”，并攻击国民党内主战派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。^①

3月30日，汪又在《复华侨某君书》中对自己出走重庆之举作如下解释：“我自从抗战开始以来，想到中国不得已而抗战，时时刻刻想着抗战怎样可以觅得和平。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，在会议里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，到了广州丢了，长沙烧了，我的意见，更加坚决，更加期其实现。我于去年12月9日经过一番激烈辩论之后，知道在会议里无采纳之望，才于18日离开重庆。”^②

显然，汪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有采纳他的“和平”主张，使他无法公开与日谈“和”，才从重庆出走的。这充分表明了他与蒋介石在应对日本侵略的问题上，是“和”还是“战”尖锐对立。

汪与蒋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从对立重新走到一起的。1932年1月28日，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，继而蒋亦返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，从而形成了汪主政、蒋主军、汪蒋共主党的再度合作局面。他们达成了对日“一面抵抗、一面交涉”的共识。

蒋汪重新合作初期，共同实行“安内攘外”政策，大肆围剿红军，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，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。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，华北危机日深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，蒋与汪在对日政策上产生了根本分歧。蒋介石对日态度趋于强硬，而汪精卫则被日本的侵略气焰所吓倒，由妥协退让最后发展到对日乞降。1935年6月下旬，关于今后对日方针，蒋介石表示：“此后再无迁就之必要。”^③蒋一再指示加紧经济建设，充实国防准备。1935年11月19日，蒋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，发表了对日外交方针的讲演，首次表明不能容忍日本继续侵略的态度，提出与日本间的交涉，“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”，如到“最后关头”，当下最后之决心。^④次年7月13日，蒋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，对“最后关头”又作了明确的解释：“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最后牺牲

① 汪伪宣传部编：《和平反共建国文献》，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，第151—156页。

② 汪伪宣传部编：《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》，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第392页。

③ 《何应钦致蒋电》，秦孝仪主编：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—对日抗战时期》绪编（一）（以下简称《绪编》），台北1981年版，第688页。

④ 蒋介石：《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讲对外方针并提建议》（1935年11月19日），《绪编》，第659页。

的时候。^① 在同年中日间举行的一系列谈判中, 蒋介石始终坚持平等互惠、尊重领土完整之原则立场。这表明他的对日政策已有重大转变。

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, 蒋即在庐山公开宣布: “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, 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, 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”; 如果“放弃寸土与主权, 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”。^② 他同时提出了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必须恢复事变前的状态等4项原则。31日, 蒋发表《告全国将士书》指出: 对于日寇的侵略, 我们已忍无可忍, 退无可退, 和平绝望, 只有抗战到底, 必须全国一致起来, 不惜牺牲, 打败倭寇, 雪我国耻, 复兴民族。^③ 抗战开始后, 蒋介石始终坚持了抗战政策, 并一再表示: “任何和平条件, 如不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完全恢复, 则中国决不欢迎调停。”^④

与之相反, 汪精卫则从其民族失败主义观点出发, 主“和”不主战, 竭力散布日本不可战胜, “战必败”, “战必亡”。他说: “中国宋末、明末曾两次亡国, 其亡国之原因, 最大最著的, 在于不说老实话”, “不说老实话只有亡国”, “没有维持和平的力量不足以言爱好和平”。^⑤ 他攻击坚决抗战论者是唱“高调”, 存“奢想”。他约集周佛海、高宗武、梅思平、陶希圣、罗君强等人, 组成“低调俱乐部”, 非议抗战, 散布抗战是“玩火适足烧身, 前途是未可乐观”; 攻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者是寄希望于“冰花镜月”中; 说“抗战到底”就是“抗战到亡”, 唯一出路是从战争途中“恢复和平”。^⑥ 汪还支持周佛海等人拟定种种与日本交涉的方案, 一再向蒋进言“和平”。

1938年, 陶德曼“调停”失败后, 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失望, 暗中策划与日本的交涉活动, 于是有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的上海、东京之行。日军占领徐州进逼武汉时, 汪更派高宗武直接与日本交涉。广州、武汉失陷后, 汪精卫认为抗战已经失败, 一面暗中加速与日本交涉, 一面公开发表文章谈话, 抨

① 蒋介石: 《御侮之限度》(1936年7月13日), 《绪编》(三), 第666页。

② 蒋介石: 《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》(1937年7月17日), 引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室编《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》, 中央党校科研究办公室1986年版, 第83—84页。

③ 蒋介石: 《告全国将士书》(1937年7月31日), 秦孝仪主编: 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—对日抗战时期·》第二编: 作战经过(二)(以下简称《作战经过》), 台北1981年版, 第86—89页。

④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: 《汪世杰日记》(手稿本)第1册, 第301—302页。

⑤ 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》, 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 第174—175页。

⑥ 周佛海: 《回忆与前瞻》, 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 第2—8页。

击抗战,主张对日求“和”。10月10日,汪发表国庆感言,以《信念与刺激性》为题,影射抗战到底,争取最后胜利,完全是“幻想”。^①11日和21日,汪先后接见德国海通社记者和英国路透社记者,发表主“和”谈话。此后,汪派高宗武、梅思平与日举行秘密会谈,在上海重光堂签订了《华协议记录》及《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》等。^②

与此同时,汪还力主促请国际调停。10月30日,当汪获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由香港行抵贵阳,将往长沙与蒋会晤时,汪即“主张设法请英法出任调停”。^③11月5日,汪又发表《最近外交方针》一文,声称:我们并不拒绝调停,我们只问调停条件,如果调停条件无害于中国的独立生存,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商量?^④

蒋介石没有接受汪之主张,仍决心继续抗战。11月1日,蒋发表《告全国国民书》,号召全国军民“共具持久不屈之决心”,抗战到底,争取最后胜利。^⑤同日,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,并案讨论了陈绍禹、陈嘉庚等“关于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,加强团结,坚持持久战,反对妥协投降的五项提案”,通过了《拥护蒋委员长决议案》,决议“拥护蒋委员长所宣示全面抗战、持久抗战、争取主动之政府既定方针”。^⑥由此,汪断定其求“和”主张“在会议里无采纳之望”,于是决心出走,独立履行《华协议记录》,另立反蒋反共的“中央政府”,与日本实现“和平”。

汪本定于“12月8日从重庆出发,10日抵达昆明”。^⑦但12月8日,蒋返抵重庆,汪未能如期脱逃。9日,蒋在黄山约集汪精卫、孔祥熙、王世杰等人商谈今后抗战大计时,“对继续抗战方针,持之极坚”,“坚称本年内不可稍涉犹豫,与日人谈妥协”。汪问蒋:“我们将认何项条件为媾和条件?”蒋答:“对外表示当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情形为条件,惟措词仍当慎重”。^⑧双方意见水火不容,汪更坚定出走决心。他寻机于18日飞往昆明,次日飞抵河内,并很快便

① 《中央日报》1938年10月11日。

② 日本外交档案 S493 号,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第290—293页。

③ 《王世杰日记》(手稿本)第1册,第415页。

④ 《政治旬刊》,第1卷第28期。

⑤ 蒋介石:《告全国国民书》,《作战经过》(二),第353页。

⑥ 《国民参政会纪实》上卷,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,第310—311页、第338页。

⑦ 《蒋介石回忆录》,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版,第97—99页。

⑧ 《王世杰日记》(手稿本)第1册,第444—445页。

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,发表《艳电》,公开接受严重侵害中国行政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近卫三原则为“议和”之根据,发表其对国事的“求和”主张。从此,汪走向投敌卖国之路。

上述情况表明,汪与蒋从合作到再次分裂,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对日的“和”“战”问题产生严重歧见。汪自称其投降卖国活动为“和平运动”,也显然是针对“抗战”而言的。汪顽固主“和”的根本原因,在于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失败主义所导致的民族投降主义,在于他对于日本“冤仇宜解不宜结”的“根本观念”^①。因此,民族投降主义才是汪从重庆出走的根本原因,即第一个原因。叶岗在他的文章中,虽言及汪与蒋在“抗战与联共方面已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,难以调和”,但却首先撇开汪蒋在抗战方面的分歧,而改引汪的反共言论以为据,并未考察汪从重庆出走的前后事实与言论,便得出汪是“从反共走向投降的”结论。叶在文章中也承认,蒋虽取抗战政策,“但其反共并未因此而改变”。既如此,试问叶岗同志,蒋为何没从反共走向降日呢?

在外敌入侵、国家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重要关头,蒋介石坚持“抗战”,而汪精卫固执“言和”。蒋主“战”就不得不联共,因为中共坚定抗战;汪主“和”就必然反共,因为中共反对投降。这种因果关系必须弄清。在反共立场上,蒋汪有一致性,只是由于主“战”与主“和”的分歧,在反共的具体做法上,蒋与汪不同罢了。

二

叶岗文中还认为:“无论从汪本人还是从日本方面来说,在汪氏离渝之前,并无成立中央政权之考虑”;“汪氏出走重庆,并非是想抛弃蒋氏而当全国的统帅”。他否认汪“出走重庆及其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个人动机”。

关于汪出走重庆前,汪日双方是否有让汪成立中政权之考虑,无需多言,只看汪日双方勾结过程,秘密会谈所订协议,便可一清二楚。

1938年1月16日,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时,即公开声称: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,妄图逼蒋下野。在高宗武等人秘密与日谈判中,

① 《中华日报》1939年7月10日,引自黄美真、张云编《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,第177—179页。

日方始终坚持蒋“下野”之条件。^①11月3日,近卫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,表示“虽国民政府,亦不拒绝”,但这时日本所指的国民政府,已不是坚持抗战政策的蒋介石国民政府,而是更换人事组织,蒋下野,由汪主持放弃抗战政策的“新国民政府”。^②11月20日,汪日双方在重光堂秘密会谈中,直接谈到了建立“新中央政府”的问题,并在所订《日华协议记录》中明确规定:在日本政府发表记录所述解决时局条件后,“汪精卫等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;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,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,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”。其中并记载,在协议过程中“依照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之意见,发表宣言,立即要求蒋介石下野,以汪为其后任,恐将于其立场不利,故改为‘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’”。^③在这次会谈中,双方还预定了汪方今后的行动计划,即在日本政府同意双方和谈条件后,汪等便设法逃出重庆去昆明,然后“汪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,即日乘飞机去河内”;同时“国民党党员联名发表反蒋声明,对中国国民以及国外华侨开展和平运动”;“成立新政府”。^④

高、梅是和汪多日“密商”后才与日进行重光堂会谈的^⑤,所订协议也已由汪正式“承认”,日本方面也“无异议”。^⑥因此,汪离渝前,无论是日方,还是汪方,都有了由汪成立中央政权之考虑,这已是铁证如山的事实。只是后来在汪逃至河内后,事态没有像其所设想的那样发展,不仅没有任何军事将领响应,就连一向被视为汪派的党政要人都不敢赞同其主张。汪欲在西南地区建立“和平政府”的计划因此流产,于是又派高宗武赴日商谈,改在沦陷区成立“新中央政府”。^⑦

汪坚持另立中央政府,与其权力欲有很大关系。汪精卫是个领袖欲很强的人,他自命不凡,不甘屈居人下。自孙中山逝世后,为了争夺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,汪在历史上就曾多次与蒋介石进行过争斗。抗战开始后,汪虽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,并相继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、国民党副总裁、

① 《汪世杰日记》(手稿本)第1册,第383页。

② 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第95页。

③ 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,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第291、294页。

④ 《今井武夫回忆录》,第97—98页。

⑤ 《渡边工作现况》(1938年11月15日),引自《今井武夫回忆录》,第303页。

⑥ 同上,第319—320页。

⑦ (日)影佐、渡边(高宗武)会谈报告》(1939年2月2日),日本外交档案资料馆藏,日本外交档案(缩微胶卷)S493号。

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,但居于蒋介石之下,没有掌握最高权力,心里很不高兴。当时,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世杰,在日记中记有:1938年1月28日,在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,司法院长居正“主张党代表大会之召集,应以推举蒋先生为国民党总裁,为其主要任务;汪次并讽汪精卫先生自行谦退,汪笑颌之”。^①表面上,汪对蒋充任总裁似无异议,实则不然。1938年4月,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正式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,汪副之。据载,“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,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”。^②

1940年3月30日,汪在南京组织伪政权后,包揽了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之主席、兼行政院长和伪国民政府主席等一系列最高职务。1941年6月3日,由伪宣传会议通过《尊崇最高领袖案》,规定在集会、演讲提到汪之名字时,要全体肃立;写文章提到汪时必须在前空一格。^③由此可见,汪的权力欲和领袖欲并不输蒋。

应该说,权力欲的高度膨胀,是导致汪出走重庆、叛国投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汪等汉奸出走重庆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对形势和战局的错误估计。他们怀疑会发生“英、美、法、俄一条阵线和日、德、义(意)一条阵线的战争”,及英美法俄会取得最后胜利;否认“我们中国,就可在这个世界战争的总结算中,得到完全的胜利”;认为日美都没有参加欧战的可能,“在日本立场,一定应在有利的形势之下,才去参加”。“如果日本在有利的形势之下参加,则最后的胜利,属于日、德、意”。^④至于中日战争,他们则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败,日本必胜。这些认识也是导致汪等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。

汪等汉奸出走重庆,走上叛国投敌之路,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。因此,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,必须首先对基本史实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这就需要认真研读已公开的相关资料与先行研究成果。从叶岗文章引文看,他似乎看过《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》这一基本资料集,但他对汪出走前后的一系列求“和”降日言论的总旨不加体察,而偏重于夹杂其中的反共言论,并得出汪之出走重庆,首先是“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”的结论。如果他看过蔡德金、

① 《王世杰日记》(手稿本)第1册,第171—172页。

② 《陈布雷回忆录》,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129页。

③ 上海《中华日报》1941年6月4日。

④ 周佛海:《回忆与前瞻》,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第11—12页。

黄美真、张云等先生的有关学术论文和专著,就应该知道,“蒋汪双簧”说早已被几位先生否定了。民族投降主义是汪等叛逆出走重庆的根本原因(即第一个原因),这是几位先生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论证过的,已经形成一致看法。叶在文章中,既没提及,也没提出任何论据反驳此种看法。

还有,叶岗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,陈述汪精卫的“赤祸大于外祸之论”时,引以为据的一段话,注明是出自汪精卫的《和平反共》一文,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一书,可是,翻遍这本资料集,根本没有汪的这篇文章。这种治学态度是极不严肃的。

另外,叶岗文章中的论据,几乎完全出自回忆文章。如为说明汪出走前汪日双方没有使汪另立中央政权之考虑,汪也没有反蒋的政治野心,他首先引金雄白(笔名朱子家)所忆《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》中的话来论证。殊不知,金雄白的回忆是在汪政权覆灭若干年后所写,由于时间的推移,记忆有可能发生差错;金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参加汪叛国投敌运动,他的回忆多根据见闻写成,并非亲身经历;更何况他后来参加了伪政权,因此他的回忆中多主观随意的推测与议论,难免有为自己开脱罪责之嫌。因此,金雄白回忆只可作参考,不足以作为论据。叶岗在文中提到陈公博与周佛海“均持这种观点”,但又不交待他们的具体言论,因此也就没有任何说服力。从文中所引影佐回忆来看,也得出叶的结论。影佐等人是代表日本政府与汪谈判的,他们“询问政府”是顺理成章的,怎能由此引出日本也无让汪成立中央政权之考虑呢?

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)